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国际政治的系统 and 过程

[美] 莫顿·卡普兰 著



薄智跃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 莫顿·卡普兰 著

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

薄智跃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 / (美) 卡普兰 (Kaplan, M.A.)

著. 薄智跃译.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书名原文: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BN 978-7-208-07502-3

I. 国… II. ①卡… ②薄… III. 系统理论—应用—国际政治—研究 IV. D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67074号

出品人 施宏俊
策划编辑 石楠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

[美] 莫顿·卡普兰 著

薄智跃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21.5

插页 2

字数 279,000

版次 2008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7502-3/D·1289

定价 32.00元

目 录

2005 年版作者序 / 1

1989 年中文版序 / 9

序(威廉·T.R. 福克斯) / 23

前言 / 26

第一部分 论行动系统 / 35

第一章 行动系统的分析 / 37

第二章 国际政治系统 / 56

第三章 国际行为体 / 92

第二部分 论过程 / 127

第四章 调节过程 / 129

第五章 一体化过程和分化过程 / 138

第六章 过程与国际政治系统 / 154

第三部分 论价值 / 189

第七章 价值领域 / 191

第八章 国家利益和其他利益 / 193

第四部分 论策略 / 209

第九章 博弈论 / 211

2 国际政治的系统 and 过程

第十章 博弈论中的一些问题 / 235

第十一章 策略与政策 / 259

结论:统一的理论 / 299

附录一 调节机制 / 305

附录二 价值领域 / 325

译名对照表 / 336

2005 年版作者序

写作《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1]纯属偶然。最初在 1954 年到 1955 年间，我准备为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写一本有关美国对外政策的书，即后来发表的《美国的对外政策：1945—1955》。^[2]我并不赞成美国这一时期的某些对外政策，尽管这些政策与当时的国际关系理论十分吻合。

同时，我对科学也很感兴趣，并买了一本罗斯·阿什比（Ross Ashby）所著的有关控制论的书，《为大脑而设计》。^[3]阿什比对系统论方法论的阐述使我很受启发，使我意识到：“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与两极系统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同一套规则不可能对两者都是最优的。后来，我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期间（即 1955 到 1956 年间），这一想法便成为我写作《系统和过程》的动因。

《系统和过程》出版于 1957 年。当时，政治学领域里实证主义（positivism）大为盛行。无论是赞成我理论的人还是反对者，都把

[1] Morton A.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57.

[2] William Reitzel, Morton A. Kaplan, and Constance Coblenz,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55*,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56.

[3] Ross Ashby, *Design for a Brain*, London: John Wiley and Sons, 1952.

2 国际政治的系统 and 过程

我当成实证主义者。其实，早在 1951 年当我还在写有关美国哲学家莫里斯·科恩（Morris R. Cohen）哲学的博士论文时，我就早已赞同他对实证主义的批评。在《系统和过程》的两个附录里可以找到我批评实证主义的确据。在一个附录里，我探讨了选择和解释证据是如何受大脑的不同状态所影响的。在另一个附录里，我研究了道德价值的客观基础和演变。

《系统和过程》所使用的理论框架与控制论相一致。可是在当时，我并不完全了解控制论的模式与现代物理学的理论模式之间的冲突。不仅当时，即使是现在，科学哲学对这一点仍未有认识。我也只是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在探索我自己的科学哲学方法论的过程中，才逐步认识到为什么现代物理学的理论模式有别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模式，以及为什么现代逻辑的形式既不同于现代物理学的理论模式又有别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模式。这些认识对道德理论有重大意义，但常常不被人理解，因为大多数研究道德理论的学者对科学哲学重视不够。

第一章介绍我方法论的控制论基础。控制论不采用普适的演绎式理论，因而所提出的问题不同于机械学的问题。如果你想知道一个特定的恒温控制系统是如何利用反馈来调节温度的话，那么你既不能采用演绎模式也不能采用普适模式。但是，如果你的问题涉及机械学——如，要用多少能量才能使一个屋子里的温度升高或者降低一度？——那么你需要采用许多几乎是普适性的机械物理学定律来回答。

第二章强调比较模式，而不是普适模式。这些反馈模式的结构与物理学的理论类型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两者各有三种平衡：基本规则的平衡；基本规则和系统其他变量之间的平衡；系统和其环境之间的平衡。如果采用这种方法，就无法得出普适或演绎的理论。

此书随后引入更复杂的因素。在第三章里，行为体的不同类型

使分析复杂化。第二部分，系统中的过程影响系统演变。第三部分，价值起作用。第四部分，策略。

我当时明确指出，《系统和过程》仅仅是介绍性的；其理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检验。上述分析框架为我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范围。我随后的第一个研究项目探讨了“势力均衡”或两极系统分别对国际法规范的影响，以及这两种影响之间的差异。我和尼古拉·deB. 卡曾巴赫（N. deB. Katzenbach）合写的《国际法的政治基础》^[1]就是这一项目的成果。

1961 年我得到福特基金会的一笔研究经费，从而可以进行一项大规模的研究项目。我在前言中曾提到用统计方法来检验结盟行为，但很快就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若不把不同类型的系统以及不同类型的环境区别开来，结盟行为的统计相关性就有可能是虚假的。而现有的类似系统数量太少，不足以使结盟行为差异的研究具有统计意义。

于是，我决定采用在前言中提到的另外一种检验方法，即历史分析方法。当然，这种历史分析方法是以第二章所提到的那些理论模式为指导的。我给学生提供奖学金，让他们在四年中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中的各种国际系统。但这些学生毕业后，却始终找不到工作。我后来发现这些大学要的毕业生是像我这样搞宏观理论的，而不是研究历史上或其他国家的单个国际系统的。

我学生的研究项目旨在比较分析我那些系统模式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有几个项目有可能使我的理论得到修正，或甚至产生新的理论。其中之一是李欧梵（Leo Ou-fan Lee）关于中国战国时期的研究。中国的国际系统在这一时期出现一种异常行为：特别是在两极

[1] Morton A. Kaplan and Nicholas deB Katzenbach,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61.

状态下，主要的行为体对反叛者施行攻击，即使这些反叛者选择中立而不是加入敌方。

一天，李欧梵告诉我，哈佛大学给他提供了一笔更优厚的奖学金，让他回哈佛攻读中国文学博士学位。但他想推掉哈佛的奖学金，因为他觉得为我做的这个项目更有意思。

限于缺乏第一手的文献资料，他的研究对于理论的发展将仅会有一些启示。即使他能建立一套新的理论，也很有可能找不到工作。因为他研究的是一个遥远的历史时期，在当时的美国政治学界没人感兴趣。那时，我已经知道我的学生因为这类研究在找工作上受影响。我便告诉他，他应当回哈佛去。自此，他在中国文学方面很有建树。

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下，我又开始了第二类研究，即通过电脑来分析“势力均衡”系统。我的助手唐纳德·莱因肯(Donald Reinken)是一位年轻的数学家，很善于编程序。他在这类研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最初的电脑演示表明，如果系统内的行为体稍有攻击性，“势力均衡”系统便会呈稳定状态。但是若把其中一个行为体的行为规则改变为无限追求能力，整个系统就变得不稳定了。由于这个无限追求能力的行为体不是最后的生存者，所以无限追求能力的策略不是最佳策略。当根据“势力均衡”系统的规则，在程序里加上对无限追求能力行为体的认知这一条件，“势力均衡”系统又变得稳定了，因为略占优势的反联盟便会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整套规则对于稳定是必需的、充分的。^[1]

我想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不同的边界条件。例如，在意大利城市国家系统时期，意大利当时的地理条件是如何影响系统稳定的？美

[1] Donald Reinken, "Computer Explorations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Morton A. Kaplan (ed.), *New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8.

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电脑专家到芝加哥大学来评估我们的这个新项目。他们对我们的初步结果很感兴趣，但要求我们在下一轮的实验中采用蒙蒂·卡洛（Monte Carlo）模拟方法。我试图向他们解释，我们并不想模拟真实系统，而只是想发现影响系统稳定的因素，但他们对我的解释似乎不太赞成。

尽管电脑里演示的“势力均衡”系统有自组性，但在我当时写《系统和过程》的时候“自组性”（self-organizing）这个概念还没有出现在科学文献中。到了1970年代，由于诺贝尔奖获得者伊利亚·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的工作，这一概念才开始进入科学文献。直到最近我才知道，恩里克·费米（Enrico Fermi）最早提出“自组性”这一概念，他还使用过我和唐纳德·莱因肯用来研究“势力均衡”系统的那台电脑。在一个系统占统治地位的完全市场上，对于单个的行为体来说，价格是一定不变的。而一个复杂的有自组性的“势力均衡”系统则不同，它的稳定取决于子系统。正如电脑项目中的无限追求能力的行为体所产生的影响一样，“势力均衡”系统的稳定取决于个别行为体的决定；而这些决定并非总是最优的。

桑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正在系统地研究有自组性的系统。研究人员发现了导致不同类型稳定系统的自组过程。在这些系统中，决定个别行为体行为的因素产生有规律的行为模式；而这些行为模式却不能从这些因素本身或普适的公式里演绎出来。

各种生物的进化——如眼睛——反映自组过程。功能不同的各类眼睛在不同的环境中演变出不同类型的机制。因而，有关反馈体系的普适的抽象理论不是忽略与归纳相关的条件就是得出一些显而易见的结论。

国际政治研究中现实主义学派（realism）倾向于后者。例如，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强调权力的极端重要性。但他把除道德之外影响国际事件的所有因素都包含在权力的概念里。莱

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在批评摩根索理论的文章中指出，道德也是权力。这样，权力的概念就变得可以解释所有可能出现的国际事件。因而，它也就无法解释任何事情（信息理论的一个定律）。

当代的国际系统既不是“势力均衡”的，也不是两极的、全球性的、等级制的或单位否定的。由于缺乏一个平衡结构，所以没有一套可供分析的基本规则。（即使在存在一个平衡结构的情况下，如有关“国家利益与其他利益”那一章所示，所要进行的分析也要比标准的现实主义理论所假设的要复杂。）每一个问题都要从转变中（即在过程中）的结构、边界条件、价值以及策略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若要研究从目前的“在过程中”阶段到一个全球性国际系统的演变，你仍然需要从系统结构、环境变化、价值和策略等角度分析这两者之间的过渡阶段。

遗憾的是，普适性的分析模式在国际政治研究中仍然十分普遍。现实主义学派就是这样一种普适性的学派，其理论核心是权力（power）概念。有些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对权力的无限追求是一种理性选择。但是，1800—1945年间两位最著名的追求权力的统治者——拿破仑和希特勒——都失败了。这一事实虽然不支持那种把对权力的无限追求作为普遍规律的看法，但也不能说明我关于“势力均衡”系统的理论就是对的。我还需要进一步说明，除了对权力无限追求的想法之外，“势力均衡”系统的所有平衡条件都存在。但是，军事力量不仅在“势力均衡”和两极系统中是保障国家生存的重要因素，而且在历史上和现在都是维护和平、保障人权的重要因素。

另有一种分析方式强调国际组织和世界秩序的建立与发展。如果走得太远，这种方法也会犯同现实主义分析一样严重的错误。在联合国的投票的确有合法化价值，从而在很多情况下可以为维护和平、保障人权做出贡献。但是，由于投票权和职责严重脱节，让各

个国家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完全服从国际组织的要求是不明智的。我们需要权衡在避免危险或加强正义与限制单边行动之间的利弊，但在当今世界上这种权衡应当视情况而定。

永久性的刑事法庭（the permanent criminal court）就是建立惩处违反人权的法律条文和目前这个体系实施这些法律条文能力之间脱节的一个例子。我们应当进一步研究为什么在民主国家里刑法制度相对有效。在稳定的民主国家里，审讯和量刑的执行是可行的，因为国家不仅有效垄断警察力量并且具有使用这一垄断力量的意愿。

如果一个执行国际法的律师想就违反人权罪起诉一个拥有化学武器或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独裁者，他应当怎么做呢？假如当年希特勒拥有化学武器，联盟国也许会考虑为那些不想死心塌地跟随希特勒的纳粹分子提供安全避难所和可观的物质奖励，尽管他们与希特勒同罪。具有强制性的特别法庭是一个更好的机制。有的时候，利用一个国家的法庭去执行国际法或本国法也许是更好、更具有教育意义的选择。

将近 50 年过去了，现在回头读《系统和过程》，发现有些地方今天会有不同的写法。我今天对系统论方法的理解，是建立在完成此书之后对宏观哲学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我的有关著述如《公义、人的本性及政治责任》和《科学、语言和人类的状况》阐明了一些我最初不太清楚的概念。我最近又在“人类本性的演变与道德和政治责任的客观性”一文中提出了知识客观性的概念。^[1]

在“人类本性的演变与道德和政治责任的客观性”一文中，我

[1] Morton A. Kaplan, *Justice, Human Nature,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6; *Science, Language,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New York: Paragon House Publishers, 1984, 1989; “Evolving Human Nature and Objective Moral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World Peace*, XIX (No. 4), 2002, pp. 63—86.

解释了知识是如何循环式地成为客观性的以及为什么这点否定了维特根斯坦的说法。维特根斯坦认为，人们无法对相互竞争的理论模式做出合理判断。由于我将道德判断和政治判断引入理性范畴，我的研究方法仍然属于希腊哲学式的理性分析。由于推理是循环式的，在理性上或社会演变上都没有终点。在写文章时我没有注意到，现在看来原则上的检验这一方法符合自组性的概念。

除了在鸣谢中提到的同事外，我还想在这里感谢那些在《系统和过程》出版后对此书及我的其他著述提出批评意见的学者。我从他们的批评中受益匪浅。我要特别感谢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指出本书在最初版中“耦合”定义中的一个错误。麻省理工的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为《世界政治》杂志写了一篇有关《系统和过程》的书评。与另外一本阐述普适性理论的书相比，他更喜欢我的书。这点对我很有启发。牛津的哲学家埃德蒙·赖特（Edmond Wright）读了我的《异化与认同》^[1]一书后，跟我进行了很有意义的交流。已故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彼得·米切尔（Peter Mitchell）在信中告诉我，他读了我的《科学、语言和人类的状况》。他的信以及后来的交流对我很有帮助。我把“人类本性的演变与道德和政治责任的客观性”一文的初稿寄给乔治敦大学的哲学教授帕特里克·希伦（Patrick Heelan），他的建议对我修改这篇文章很有帮助。

最后，我要感谢约翰·维利出版社的戈登·莱哈蒂（Gordon Ierardi）。非常感谢他支持一本在当时看来有些格格不入的书。可惜，他英年早逝。

[1] Morton A. Kaplan, *Alien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6.

1989 年中文版序

我很高兴薄智跃先生将《国际政治的系统 and 过程》一书译成中文，并附上此序以示感谢。我期望，在明天的世界上，中国和中国新一代的学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国际政治的系统 and 过程》是 1955 年到 1956 年间写就于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当时我刚刚完成《美国对外政策：1945—1955》一书的初稿。到那时为止，国际关系一直被视为一个无政府系统，其中权力决定结果。当时，人们也使用“均势”和“两极”这些术语，但把它们看做仅仅是对同样无政府的过程进行描述的语汇。这在我看来似乎是明显错误的。确实，正式的国际政府并不存在。但是，当时一些部族也没有什么政府，而系统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却存在着，并且延续下来。

在我写有关对外政策的书时，发现“均势”系统和松散的两极系统之间在系统特征方面存在着诸多实质性的区别，认识到在两极系统内在北约之外建立联盟何以无效的原因（这与“均势”系统的情况形成对照），也懂得了为什么不结盟的行为体和组织如联合国即使不像某些最热衷于这类组织的人所声称的那样具有惊天动地的潜力，也可能具有真正的功能价值。同时，我阅读了罗斯·阿什比的《为大脑而设计》，这本书为我在分析这类丧失功能的现象时使用系统分析方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在西方，50年代中期也是某种形式的实证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当时，我并不赞成这种哲学观点，但我还是把关于价值的那一章放到附录中，以免遭到因宣布价值的客观性而可能引起的暴风雨般的批评指责。从那时起，我一直在发展我自己的哲学观点，这一观点在《科学、语言和人类的条件》一书中以最系统的形式提出。在这本书中，我建立了一种相互关联的语言理论，采用了布尔的互补理论以避免在结构松散的世界上所出现的矛盾，并提出一种基于理论互补性和实际估价的科学哲学。我还说明了当不能完美地把一种语言或理论思想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或理论思想时无法采用同一标准的问题如何得以解决的方法。据我所知，惟一与我的观点相近的观点反映在里查德·施莱格尔（Richard Schlegel）的大作《关联现实主义》（*Contextual Realism*, Paragon House, 1986）中。

我们当时采用了两种方法来建立《系统和过程》的理论。其一是使用计算机。在计算机上，我们采用了我们称之为“均势”系统的“现实化模型”，因为我们不能找到一种严密的演绎方法来为像国际系统这么复杂的系统建立一种理论。当然，我们并没有把该系统的基本规则输入计算机，因为假使我们这样做了，显然会得出与规则相一致的行为来。我们所采用的“现实化模型”涉及到把这种理论的某些特征作为参数编入计算机程序中的问题。我们当时采用了各种参数以了解计算机程序对参数变化的敏感性。这样，才有可能发现局中人的数目、交战的比率、局中人的动机等变化。

编制这样的程序存在若干问题。就形式而言，每个计算机方程式都是特定的，而不是一般的。因此，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就是：这些方程式可能与事实相悖。所以，我们芝加哥研究小组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研究计算机程序的各种单一特征，目的是想弄清楚程序中某些不应当与现实世界的相关特征联系起来的微小差异不会影响计算机的运算结果。

这种计算机模型只有在—场战争的情况下是最优化的。战争重复出现的情况过于复杂，计算机无法保证长期的最优化。但是，如果确定了行为体的效用表——若没有这样的效用表，它们就没有动机，而没有动机，行动就不会出现——我们就可以进行计算，看由这个程序建立起来的局的格式是否产生与局中人的效用表相“吻合”的结局，或者是否某种别的格式会更好些。

计算机程序中的一个变量是行为体对其他行为体之间的“平衡”的忍受程度。可以假定这一变量很大，也可以把它假设为零。在后一种情况下，行为体所关心的只能是增强自己的实力。这种情况是一种特殊情况，它与沃尔兹的无政府系统相一致。在沃尔兹的无政府系统内，每个国家在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只考虑外部的限制因素。这种情况与赖克的模型也是一致的。在赖克的模型中，在只有一个回合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零和最优化。当追求“平衡”的倾向很强时，系统内不会出现战争。当追求“平衡”的倾向既不弱也不强时，系统会一方面不断出现战争一方面又保持绝对稳定。如果连一个行为体都不能容忍“平衡”，系统就会很快出现不稳定。

在这种简单的层次上，计算机的例子可以说明历史对比研究所业已揭示的事实。如果行为体不是自觉地考虑系统稳定的要求，那么，只有在某种系统之外的因素——如后勤或政权困难——阻止该系统的运转的情况下，“均势”系统才会是稳定的。另外，只有当一个行为体为了谋求霸权甚至不惜冒被毁灭的极大风险时，它才会产生违犯基本规则的动机。

就系统之外的原因而言，只有建立一种对付背离活动的标准，行为体才不至于甘冒一切风险以获得霸权。在这种情况下，系统是稳定的，即便没有这种相当于规则四或规则六（行为体由于某种系统之外的原因而被消灭的规则）的规则，有谋霸倾向的行为体表现出这种倾向也无益于它的长远利益；从长远看来，这个行为体如果

这么做，它就会成为一个失败者。只有在系统条件出现某种别的异常——其他行为体不能正确地认识它们所处的局势，或因政权内部的问题使它们无法正确认识局势——时，有谋求霸权倾向的行为体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因此，所有这些规则对于平衡来说都是必要的，而且这套规则是完整的。这些规则在很大的边际变动范围内是稳定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局中人对遵循规则感兴趣，以及为什么联盟系统具有它们所具有的特征。我们解释了除非某种系统之外的原因为它们提供一种可望成功的机会，追求霸权的局中人会遵循规则的原因。进一步说，系统的平衡还取决于行为体在制定决策时把系统的结构考虑进去的事实。而且，这一系统显然是一个非零和系统。计算机模型证明：沃尔兹对基本规则的反对纯属误解。

我来总结一下计算机现实化模型所证明的。我说“证明”，不是说“通过验证来排除一切疑问”，因为无论是对语言理论还是对计算机模型进行适当分析都会使现在尚不明显的问题突出出来。另外，我说“证明”，是因为与语言理论框架结合在一起的现实化模型已经达到一种比著述中任何别的东西在前后连贯、精确分析、和理论适当性的理解方面都高得多的状态——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怀疑可以站得住脚。

现实化模型证明：在平衡的条件下，规则集中没有矛盾。它说明，没有一个规则被违犯；除了对付背离行为的规则——在没有追求霸权的局中人的情况下，这条规则是没有必要的——之外，所有的规则都为行为体所遵守。这种阿拉伯数字的现实化模型证明：如果谋求霸权的局中人是系统中的一个行为体，而且这个行为体行为的动机就是谋求霸权，那么，假使没有制约背离行为的规则，这个系统也会变得不稳定起来。由于它证明了对于追求“平衡”的局中人来说该系统会因此而变得不稳定和充满危险，所以它就为增加一